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王船山诗词情景契合英译再现初探

叶从领,殷习芳¹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生态翻译理论认为,译者首先要进入原文生态环境,适应该环境;其次,译者又要重新回到译入语的环境。文章从生态翻译视角,探讨了王船山诗词的情景契合英译再现,通过对两首王船山诗词的英译分析,得出要使英译译文生态达到最佳状态,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生态环境,译者必须既要尊重原语语言文化及其生态,又要充分考虑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生态诉求。

[关键词] 王船山诗词; 生态翻译学; 情景契合

[中图分类号] H315.9;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74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5-0025-07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中国文化战略出现了有别以往的重大转向,从以译介国外文化为主转为译介国外文化与译介中华文化并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均大力支持弘扬中华文化、译介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地方文化典型代表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它的内容博大而精深,它的形式纷繁而多样,它的影响深刻而长远。湖南衡阳人王夫之,别名王船山,作为湖湘文化传承人的典型代表,与顾炎武、黄宗羲一道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治学领域甚广,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于经、史、文学,故而被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员弗·格·布洛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船山一生勤于创作,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著作。其中诗词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现存于世有近2000首。然而,相对于王船山学术理论思想研究而言,王船山诗词研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王船山诗词是王船山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地体现了王船山诗学理论思想,王船山诗词本体研究及其英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文

化价值。

一 王船山诗学理论

王国维《文学小言》中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态度也。”^[1]景与情是中国古典抒情诗词创作的根本原力。明朝陈嗣初说:“情与景会,景与情合,始可言诗矣”“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2]王船山认为情与景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不可分离,情与景的对立统一,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的契合更能彰显出和谐之美。

王船山最系统、最深刻的文学思想当属情景理论。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古典诗学情景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认为作文作诗,要富有感情,不可无病呻吟。他认为情感是诗歌的基本要求,在他看来诗歌由唐诗的巅峰到宋明以降有失偏驳之处。他提出“文章之道,各自有宜”(评高适《自颍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自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

[收稿日期] 2019-12-25

[基金项目] 衡阳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王船山诗词翻译研究”资助(编号:2014D144);衡阳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歌语篇连贯性的认知分析及其翻译”资助(编号:2016D13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立项项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要讲话中的隐喻英译译介研究”资助(编号:19C1622)。

[作者简介] 叶从领(1981-),男,安徽寿县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¹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礼》《春秋》去,彼不能带《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讲解,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明确反对以学理来代替感情,也反对模糊诗歌、史书界限的“史诗”。

其次,他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诗言志”的基础上,提出了“心之原声”“发言为诗”的观点。“诗以道情,道之言路也。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入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夫之尤为看重诗文的社会功用,认为化情为诗的作品,应能“动人兴观群怨,摄兴观群怨为一炉”(评杜甫《野望》)。

再次,为了让诗文能更好地“兴观群怨”,王船山认为作诗文之人应妥善处理情与景、情与声的关系。“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景不可“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而应坚持“即景合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概,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以及“情景相入,涯际不分”等等。

王船山的情景契合理论,貌似简单,实则无论其广度,还是其深度,内容都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自成一格。他的诗词立足于情景契合理论,均言之有物,绝不会无痛呻吟,其中既有景也有情,情景交融。情景契合理论既包含创作理论,也包含鉴赏理论。其中“景生情,情生景”关乎抒情诗的创作,“情中景,景中情”关乎诗词鉴赏。也就是说,王船山关于情景关系的诗词理论既立足于诗词创作,又着眼于诗词鉴赏两个维度。因此,情景契合既是王船山诗词创作理论的最大特色和基本要求,也是其诗词鉴赏理论的指导原则,更是王船山诗词的语言生态特征。

二 生态翻译学理论与王船山情景契合诗学理论的关联

“生态”这一词汇早就为人熟知,如人文生态、农业生态、景观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大学生生态、电影生态等等。“生态学”(ecology)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 Ernst Haeckel 于 1866 年提出,在当时指的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研究有机物与他们

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自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现代环保运动诞生之后,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由特定的科学术语扩展为人类对于其自身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研究。

1972 年,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把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提出“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他将语言及言语社团视为生物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把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隐喻模式,被称为“豪根模式”。“豪根模式”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语言发展和语言保护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豪根模式”也常常被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随后,1990 年韩礼德(Halliday)从新的角度评述了生态和语言的关系,强调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能作出哪些工作和贡献,形成了非隐喻性的“韩礼德模式”,也被称为“环境语言学”^[3]。

经过语言学家们的努力,新兴的学科“生态语言学”逐渐形成了。生态语言学引入生物生态学的有关概念、理论及方法,主要研究语言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该理论已经延伸至语言与社会关系之中的各个领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教学、翻译、文化与方言等保护方面。

目前,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翻译的国内学者,首推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他提出,“翻译理论在经历了丰富、细繁的研究之后,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思考问题是否也值得一试?”^[4]有鉴于此,胡教授推出了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

“每一个人都是与自然相通的,以有限的方式与无限的存在相通。”^[5]任何事物与其环境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的翻译活动也不例外。罗森纳·沃伦指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6]。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7]生态翻译学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把翻译定义为“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

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8],即翻译的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明确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翻译适应选择论。具有动态“双重身份”的译者,一方面受制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选择和操纵译文^[9]。

生态翻译学将全部翻译活动视为一个动态的、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首先进入原文生态环境,适应该环境;其次,译者以新身份回到译入语环境,根据自身理解在译入语中选择适当呈现方式实施翻译,使译文能够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以达到译文能够与译语环境和谐共生。生态翻译学认为,译文对于译语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决定着译语生态的平衡度和和谐度,二者之间成正比例关系,成功的翻译是译者成功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7]。

中国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立的或人单纯地利用自然的关系,而是源初相通的。远古时期就有“神人以和”的观念,先秦时期的道儒两家也追崇“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认为,人的生理规律、精神生活等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因而人要回归自然,回到源初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认为,社会伦理道德规律和自然规律是相通的,因此人要遵守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以达到社会和谐,“天人合一”。虽然两家的论证过程不一样,但目的是一致的,即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总之,“天人合一”倡导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伦理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认为艺术与现实、作者情感与客观对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不仅仅体现在艺术反映生活的层面上,而且体现在艺术与现实、主体的“情”与客体的“景”之间的相互感应、二者合一、融为一体中。

由此观之,可以明显地看出以下两组关系:(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为王船山诗词创作理论中的情景契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源,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发展,二者是互相融通的。(2)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生态理念相互暗合,互为融通,即二者均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可以说,王船山诗词理论中的情景契合与生态语言学理念、生态翻译学理论可以相互沟通,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融通性。

三 王船山诗词译文情景契合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王船山诗词众体兼备,内容之广,思想之渊博,在历代的著述家中首屈一指。船山诗词既体现了时代的心声,又展露了个人的心迹,极具诗史价值。船山诗词的研究始于晚清。1840年,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为两百年来学者首次发掘整理船山遗著。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书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船山之学逐渐为人们所知悉,风靡湖湘,影响全国。随后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船山诗词进行评析^[9]。

王船山诗词的英译与日渐凸显的船山诗词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船山诗词英译及其相关论文、书籍寥寥无几。国外汉学家中,仅有英国的西里尔·柏芝(Cryil Birch),在他1972年出版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2集中翻译了王船山的《清平乐·咏雨》《玉楼春·白莲》《蝶恋花·铜管戍火》等3首。截至目前,国内仅有南华大学蒋显文、全华凌两位教授主译的《王船山词今译与英译》。该书由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收集、翻译了王船山词一共283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只收集、翻译了王船山词,至于其他体裁的诗歌,则未能加以收集翻译。另外,该书在其前言中明白交代:“我们译王船山词即以意译为主……”。该书中的译文总体来说,平白、流畅、自然、通俗,这既是它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不足。不足在于,与原文相比,译文诗性骤减,甚至索然无味,因为译文虽然摆脱了原文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是原文诗歌所应有的生态特性也因此被剥夺殆尽,而译文本身又未能产生英文诗歌所特有的生态特征。由此观之,王船山诗词翻译任重而道远。基于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结合“天人合一”思想,分析两首王船山诗词英译,为诗词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王船山诗词,体例众多,留存于世的诗作有《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柳岸吟》《分体稿》《编年稿》《剩稿》《落花诗》《造兴诗》《和梅花百咏》《洞庭秋》《雁字诗》《仿体诗》《忆得》等,合计667篇,1645首。体裁有古体诗、近体诗、五律、七律、七绝。词作有四种,即《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愚鼓词》等,合计305首。

本文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诗、词各一首,即《重登双髻峰》和《忆秦娥·灯花》作为示例。《重登双髻峰》的创作背景为:当时大清王朝在北方地位日趋稳固,而明王朝却摇摇欲坠,日薄西山,行将亡

国。此时的作者因北方失地而悲痛万分,对未来一片茫然,作者的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对于以明朝遗老自居的王船山而言,简直是虽生犹死,万念俱灰。而《忆秦娥·灯花》的创作,据推测应是悼亡妻之作。丧偶乃人生之大不幸、大悲痛。此词表面的平淡之下,却充满了人生的悲凉、无奈、孤独。这两首诗词都是在作者大悲大痛之后的作品,它们把情景契合的王船山诗词创作理论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具代表性。

王船山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充分体现了情景契合的理论,在情景共生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诗歌中“景中情”“情中景”“情景合一”的审美意象。先看王船山的《重登双髻峰》及其英译本:

拾级千寻上,登临一倍难。

日斜双树径,云满曼花坛。

龙雨腥还合,佛灯青欲残。

振衣情不惬,北望暮云寒。

Returning to Shuangji Peak

I climb the mountain;

but the peak is difficult to attain.

The setting sun casts its glow upon the trees,

clouds fill the flowered terrain.

Thunderstorms finally cease;

Offering lamps flicker out again.

I shake my robes; my spirits remain low.

I look north; the clouds at dusk are cold.

(注释: Shuangji Peak, which is located in Hunan Province, is so named because its shape is like a lady's hair done up into two buns.)

Translated by Yang Zhuojun^[10]

中国古典诗歌以描写现实世界,注重情景交融为主要特征,诗歌中充满着由自然景物构成的意象。王船山此诗中的自然景物主要由大山、落日、树木、小径、花坛、暴雨、佛灯和暮云构成。另外,诗中含有为数不多却至关重要的形容词:难、残、寒以及不惬。熟悉中国传统诗词的人一看便知,这首诗歌充满着忧伤、无奈,气氛低沉压抑,似乎诗人内心有很深的郁结,导致诗人心情“不惬”,甚至感到越发吃力,难以登上那有千寻之多的大山台阶。这就是这首诗歌原文生态体系,带给读者的初始印象。如果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满清政权在中国北方地区立足已稳,大明王朝越发颓废,加之诗人的恩人兼好友去世,此时的作者心情十分沉重。

带着这样的沉重心情再次攀登双髻峰,作者的眼里所看到的“景”象,自然饱含遗憾、愤懑。诗中的自然之“景”与相关的历史背景,共同构筑了整首诗歌大致的源语生态体系,进而产生了一幅由“景”生“情”的生动画卷,达到了“情”“景”的高度契合,完美、和谐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然而,这些东方传统的有机自然观如何移植到译文中,生态翻译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把翻译生态喻指类比为自然生态,将生态翻译界定为在翻译中如何将原文的自然观移植到译文中。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1987 年在他的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是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达到交际意图的过程。顺应体现为语言的使用环境和语言结构选择之间的相互适应。译者采用直译方法,“mountain, setting, sun, trees, flowered terrain, thunderstorm, offering lamp, robe and clouds”再现了原诗中的自然景象。“low, cold, difficult”等形容词能与原文一一对等,让译文读者也能猜测到原文读者般心情郁结的感受,成功再现了原诗的情景契合。译者在翻译“双树”和“一倍难”时,采用了略译的模糊翻译,是为了顺应译入语文化。纵观全诗,虽然原诗没有一句有人称主语,但是为了适应英语的句法生态,符合英语规范,译者选择了第一人称“I”,意图使诗歌主体“I”置身于自然实体之中,体味作者船山当时沉重忧虑的“暮云寒”心情。如此翻译,译者与作者情思相和,人与自然达到“致中和”“天人合一”的境界。作者在翻译标题“双髻峰”时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目的是为了保留中国文化意象,传达中国文化内涵。此外,该译文前四句末尾形成了 aabab 的押韵,赋予整首诗歌一定的韵律。总之,英文译文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诗的汉语语言生态环境。

当然,该译文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其一,该译文最后两句若能与前文一道,共同形成完整的诗歌韵律,则整体乐感会大大增强。其二,相对诗歌原文而言,译文缺少音步节奏,这就大大降低了译文的诗性,而诗性恰恰又是诗歌最大的语言生态特征。

再来看王船山的一首因情设景的词《忆秦娥·灯花》及其两篇英文译文。

心未冷,娟娟还弄斜阳影。斜阳影,半点红轻,一天烟暝。

残香犹袅金猊鼎,泪痕微映鸳鸯枕。鸳鸯枕,如何落去,孤衾难整。

译文一:

Dream of a Fair Maiden Lantern Papercut
With a deeply sorrowful heart without delight,
I play with my own shadow in the setting sunlight.
My own shadow in the setting sunlight
turns light red on the ground.
Dim smoke fills the house all day round.

The faint aroma of the incense of the tripod lingers
in the air.

Tears leave stains on the pillow embroidered with
mandarin ducks.

On the pillow embroidered with mandarin ducks,
how can I fall asleep, with luck?

A white night awaits me, I am aware.

Translated by Yin Xi-fang & Ye Cong-ling

译文二:

With a high-sorrowful heart,

I was playing with my own shadow alone in the
flickering candlelight.

The light was casting red light on my long shadow.

The whole house was filled with the dim candle
smoke.

The incense is lingering on the tripod.

Some tear stains are still on the Mandarin duck
pillow,

upon which how can I rest my head?

I am afraid that it brings sleepless nights to me.

Translated by Jiang Xianwen etc.

该词的主旨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予以断定。《王船山词今译与英译》一书仅推断:“此词见《鼓棹初集》,未载年份。玩词意,亦为悼陶孺人之作,故以系于《忆秦娥·灯花》之后。”^[11]故而本文暂且也以此待之。

该词通过描写从夜晚到夜深景物与情感的变化,表达了对亡妻的深切思念。词的上阕写灯花,一片烛光斜影、烟雾笼罩之景,作者翩翩衣袖嬉弄自己的影子,似无忧伤之意,实则“藏哀于乐”。下阕开始事物转换,从残香、泪痕、独卧的鸳鸯枕写起,无不透着哀伤的情绪。作者以屋内之象比屋外之景,情感逐步加深,触处生悲。我们所说的因情设景诗词,

通常也是先有主观情感,然后在词中采取描写、比喻等修辞手法,移情于景物,使情景契合。因此,在翻译这首词时,我们也要采用生态的翻译方法,考虑目的语读者的生态诉求,在译文中彰显出生态的情景和谐。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西方语言思维方式多为抽象思维,汉语思维方式多为形象思维。英语是注重逻辑和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注重意合,具有典型的隐含性和灵活性,不受人称、时间的限制,汉语几乎是模拟自然的语言。“汉语语言自然地没有语法”,就像“自然本身没有语法一样”^[12]。因此,费诺罗萨提出翻译时尽量突破英语逻辑的限制,模仿汉诗词的句子结构,去掉系动词,选择强有力的单个动词^[13]。因为汉语诗词中的动词具体有力,能展现原诗中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充分再现原诗词的多重韵味。他认为系动词是西方社会执着于将人类凌驾于自然生态并用逻辑去支配自然生态的明证,而汉语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以下为具体评析:

第一,王船山的作品中有不少锤炼动词的地方,在《忆秦娥·灯花》这首词中,“弄”和“袅”等字眼突显原作的动态感受,使景物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真切,睹物思人。

译文一、二都充分考虑动词的选择,尽量避开系动词,顺应原文生态用一些具象词,如“play with”“fills”“lingers”“leave”“awaits”等等。具象词可以激发、强化作者的情感,使作品充满想象,积聚能量,能够更大程度地再现原文的“情”“景”契合。

第二,原文开头“心未冷,娟娟还弄斜阳影”所表达的字面意义,乍一看,似乎作者的心情还算不错。但是,读完全诗后才发现,所谓“心未冷”并非实情,只是作者强打性情,说反话而已。译文一、二都没有采取与原文相似的表述方式,而是直赋其意“With a deeply sorrowful heart without delight”或者“With a high-sorrowful hear”,两篇译文译者的目的无非是使译文读者能解读原文之意。之所以这样,当然是为了使译文前后行文更加自然,使整篇译文的整体生态更加平衡。反之,若开头译文也采取原文的反话正说,译为“with my heart not sorrowful”,那么就会与下文的“泪痕”“孤衾难整”自相矛盾了。若如此,则译文就没有任何语言生态平衡可言,自然也就失去了可读性。

第三,原文中的各种“景”象,如人心、斜阳、身

影、香雾、香炉、泪痕、鸳鸯枕等基本上在两个译本中都得以最大限度保留,这样译文能具有原文所有的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似乎译文读者能够如原文读者一样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情”。两篇译文译者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汉语中的“景”象或意象所包含的寓意并不必然等同其所对应的英语“景”象或意象所有的寓意,因为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生态的解读。故而,英文读者仍然很难像原文读者般体会到其中的旨意。

第四,该词属于典型的古典词类体裁形式,有着严格的原生态标准:形式要求、字数要求、韵律要求。译文一,虽然谈不上符合标准英语诗歌的原生态要求,相对而言也算是具有比较简洁的诗歌形式特征。而且,译文一具有明显的诗歌所有的韵律,形成了aaabb, cdddc的韵律节奏,颇有诗歌之韵味。相比之下,译文二虽说明白、通畅,但是由于缺失了诗歌的生态特征,打破了诗歌应有的各个生态要素之间的平衡,破坏了“景”“情”的契合,放弃了“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最终无法适应英语语言生态的语境,只能徒有“景”象,而诗性尽失。

这两首诗词的景物描写和表达的思想情感都是和谐统一的,但是它们在表达方式上各有特点。《重登双髻峰》采取移步换形方法描写在登山的过程中所见到的不同景物,气氛与诗人沉重的心情呼应。《忆秦娥·灯花》通过对环境景物的描写,加深整首词的悲凉之意,表达了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在翻译这两首诗词时,译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生态翻译策略和方法。在翻译《重登双髻峰》时,译者尽量顺应译入语语言环境和语言文化结构,使作者、译者、读者共享译诗的生态和谐。而在翻译《忆秦娥·灯花》时,译文一的译者努力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东方有机自然观移植到译文中,尝试中国古典诗词生态翻译新转向。

四 结 语

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情景契合、“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如何在英译中得以体现,是事关整首诗词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本文结合生态翻译学理论,通过对王船山两首诗词的英译分析得出,传统诗词英译的成功不仅体现出原文诗词的基本意义,如若再把原文诗词中的“景”象或者意象直接或间接基本保留,则能把原诗词的整个语言生态、语境生态最大限度地再现。为此,译者既要尊重原语的语言

文化结构,传承原语文化传统,又要充分考虑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诉求,采用多种生态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使译文生态达到最佳状态。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对于诗词原文中以景象或意象等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原文中的这些景象或意象经过对等翻译之后,译文能否达到“情”“景”契合,译文读者能否产生像原文读者般的情感体验。

第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即译者以及与译者有关的各种其他因素对于译文的措辞的选择。若诗词原文中的景象或意象经过对等翻译之后,并不能产生原文诗词般的“天人合一”的和合效果,则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得以凸显出来:通过译者的能动选择,要么更换为其他景象或意象,以便取得类似于原文的语言生态环境,达到一定的语义效果、意境效果;要么忍痛割爱,予以省略,直译其意,这虽属无奈之举,但仍可传达原文诗词的主旨。

诚然,目前对于王船山诗词英译研究还很缺乏,本文只是初步尝试将生态翻译学理论用于王船山诗词情景契合英译研究,所涉及深度、广度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5.
- [2] 王船山. 王船山诗文集: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13):1;9-12.
- [4]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4):90-95.
- [5] 钱津. 生存的选择[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206.
- [6] WARREN R. 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 from the Field [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6.
- [7]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0.
- [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6.
- [9] 陈志斌,胡港. 王船山词的语言艺术[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25-31.
- [10] 阳卓君. 谁解其中味:味象论视角下的王船山诗歌英译——以《重登双髻峰》为例[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9-121.

- [11] 全华凌,蒋显文.王船山词今译与英译[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8.
- [12] 陈月红.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论汉诗英译中的生态翻译转向[J].外语教学,2015(2):101-104.
- [13] FENOLLOSA ERNEST, EZRA POUND.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M]//Haun Saussy, Jonathan Stalling, Lucas Klein. A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90.

On the Reproduction of Union of Scene and Sensa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ang Chuanshan'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YE Chong-ling, YIN Xi-f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hold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first enter into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o as to adapt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n come into to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union of scene and sensation in Wang Chuanshan's poems. After analyzing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wo of Wang Chuanshan's poems,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ximal rep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ranslators should not only respect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should have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s poems; eco-translatology; the union of scene and sensation

(本文编辑:刘衍永)